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World

国际汉语

第四辑

汉语教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周小兵 主编
韩一瑾 副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World

国际汉语

第四辑

汉语教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周小兵 主编
韩一瑾 副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汉语. 第四辑, 汉语教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周小兵主编.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 - 7 - 306 - 06295 - 6

I. ①国… II. ①周…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文集 IV. ①H19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8165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李海东

责任编辑: 李海东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刘丽丽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1.75 印张 286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本书编委会

主 编：周小兵

副主编：韩一瑾

编辑组：范常喜 韩一瑾 洪 炜 周小兵

前 言

2016年11月5—6日,汉语教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第八届年会在中山大学召开。会议由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和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中山大学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中山大学对外汉语研究所协办。来自法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78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此次会议收到近百篇论文,有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角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016年末我们开始筹备出版论文集。与会代表将提交给会议的论文进行了精心修改,紧扣“汉语教材史”这一主题,内容更加丰富,分析更加深入。经专家匿名评审,最后有十九篇论文入选论文集,是为《国际汉语》的第四辑。

论文分为五个专题:教材与语法研究,汉学与汉语教育,东亚教材史,西方教材史,当代汉语教材。

“教材与语法研究”专题,既有对近代西方汉语教材教学语法体系的宏观考察,也有对《语言自述集》《中国语语法》《汉语的本质与历史》等著作的个案研究。

“汉学与汉语教育”专题收录四篇文章,分别从法国汉语教育史、汉学家与汉语教育、西洋人眼中的南北官话、基督教传教士不同传教思想指导下的汉语学习四个角度,对汉学与汉语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

“东亚教材史”专题,既有对《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所辑汉语教本文献内容及资料来源的考订,又有对仓石武四郎先生为《拉丁化新文字中国语初级教本》与《中国语模范会话》所做两篇日文序言的详尽注释,还有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探讨《增广贤文》在韩国二语教学上的价值。

“西方教材史”专题,对谋乐的《德汉课程》、司登得的《汉英合璧相连字汇》、马礼逊著作中的《拜客问答》做了细致的调查与分析。

“当代汉语教材”专题,一篇是中高级汉语视听说教材分析;一篇是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研究;还有三篇是对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包括医学专业汉语教材、中医专业汉语教材,以及服务于外籍家庭主妇的汉语教材的考察。

希望论文集的出版,能为学界同仁提供一个分享、交流成果的平台,能为推动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汉语教材研究贡献微薄的力量。

论文集编辑过程中,我的博士生贾蕃、师文,硕士生刘苗苗做了不少协助工作。中山大学出版社对论文集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周小兵

2018年1月6日

目 录

一、教材与语法研究

- 高本汉对汉语语法特征的认识 方环海 闻雨轩 宋旭东 钟 烨 1
《中国语语法》(1921):从句法结构分析入手 李无未 12
近代西方汉语教材与教学语法 周小兵 张惠芬 蔡建丰 师 文 27
《语言自述集》汉语语法研究札记 朱其智 36

二、汉学与汉语教育

- 法国汉语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白乐桑 43
法国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慕沙的中国语言研究——以《汉文启蒙》
为中心 李 真 52
19 世纪西洋人眼中的中国通用语言——以汉英课本为核心资料 塩山正纯 58
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传教士不同传教思想指导下的汉语
学习 于锦恩 杨思佳 66

三、东亚教材史

- 《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所辑汉语教本文献内容及资料来源考订 陈珊珊 76
《拉丁化新文字中国语初级教本》与《中国语模范会话》“序言”译注
..... 范常喜 陈 辉 88
从跨文化交际看《增广贤文》的二语教学价值 孟柱亿 96

四、西方教材史

- 谋乐《德汉课程》(1914)词汇教学特点管窥 高 兰 103
司登得《汉英合璧相连字汇》谱系考 韩一瑾 115
马礼逊著作中的《拜客问答》 朱 凤 123

五、当代汉语教材

- 论专业医学汉语教材的编写原则——以《专业基础医学
汉语——细胞生物学篇》为例 邓淑兰 莫秀英 131
面向零起点外籍家庭主妇的汉语教材设计 邓小宁 陈 琳 亚雪芳 139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情态动词释义模式的对比研究 李 英 陈春红 152
中高级汉语视听说教材词汇考察 刘宏帆 164
中医汉语教材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周延松 171

一、教材与语法研究

高本汉对汉语语法特征的认识^①

方环海 闻雨轩 宋旭东 钟 烨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摘 要: 高本汉对汉语语法的类型特征颇多关注,其著作《汉语的本质与历史》分别涉及汉语的很多方面,其中语法部分所占内容最多。作为西方的一位知名汉学家,该书是高本汉写给欧洲大学生学习汉语的入门级教科书,站在欧洲人的他域视角,论述了汉语与其他有屈折形态的语言相比所具有的类型特征。本文拟对此作出评述,基于国际汉语教学的背景,高本汉基于他域的对汉语特征的认识应该引起国际汉语教学界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 高本汉;汉学;汉语;习得;语法特征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 是西方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946 年的作品,原文为瑞典文;1949 年被翻译成英文;1963 年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出版了杜其容的译本,名为《中国语之性质及其历史》;201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聂鸿飞的译本,名为《汉语的本质与历史》^②。除去开始的引文与最后的结语,该书主体内容分别涉及汉语的文字、音韵、语法与语义等四个方面,其中,语法部分所占篇幅将近一半。

究其写作主旨而言,该书是高本汉写给欧洲大学生的汉语教科书。他站在欧洲人如何有效习得汉语的视角,来说明汉语与欧洲的诸多有屈折形态的语言相比,具有哪些类型学意义上的特征。^③ 可见,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时最头疼的并不是汉字的字形,而是汉语里没有清楚的标记可以帮助他们分辨词性以及词在句子中的作用。西方的汉语二语学习者经常难以判断一个词是名词还是动词,更不能判断一个词是谓语还是定语。^④ 当然,站在语言习得理论的视角,汉语的这些特征恰恰是欧洲人习得汉语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之处。

①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 世纪稀见英文期刊与汉语域外传播研究”(15BYY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7—19 世纪欧洲汉学视野中的汉语类型特征研究”(13YJAZH021) 的阶段性成果。

② 本文中凡是引自该书的内容会在脚注中直接注明“高本汉(1946)”并标出页码,不再标出详细信息。另外,高本汉还著有《中国语与中国文》(1923),张世禄译,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后文凡是引自该书的则直接注明“高本汉(1923)”并标出页码;《中国语言学研究》(1926),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后文凡是引自该书的则直接注明“高本汉(1926)”并标出页码。

③ 聂鸿音:《导读》,载高本汉(1946),第 3 页。

④ 聂鸿音:《导读》,载高本汉(1946),第 9~10 页。

1 汉语在语言形态序列中的位置

从19世纪开始，西方的汉学家们在国家扩张的过程中，试图通过语言对比建立各种不同的语言类型，西方在与东方语言对比的过程中也试图确立西方语言的自身。

根据西方汉学家们先验的逻辑思路，世界语言的发展与进化的类型次序是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他们先验地将屈折语设定为人类语言发展的高级阶段，将孤立语设定为人类语言的原始阶段，语言的演化类型是从“初等”的“孤立型”走向“黏着型”，最后才走向“高等”的“屈折型”的。在西方早期的汉学家看来，汉语缺乏词形的形态变化，缺乏屈折与派生手段，这一点似乎验证了汉语是一门原始性的悠久语言，这样才可以推论出“汉语是一门非常原始的语言”的论调，并且谬种流传。他们甚至认为，汉语几千年保持停滞不变，一直停留在最原始的阶段，成为一种静止性的语言，还没有发展出类似拉丁语、希腊语、俄语、德语等西方语言那种以丰富的形态系统为基础的精美的屈折表达手段。^①如高本汉所言，“无怪乎十九世纪学者起初研究各种语言的分类及其特性时，中国语是归入于原始的未发达的一类之中”^②。

其实，时过不久，人们就对西方汉学家们的观点表示质疑，从其他语言的对比中似乎也表明这种观点并不能站得住脚。根据观察与报道，在非洲、澳洲、美洲等地的一大批原始部落里，仍然存在着一一些语法形式上屈折形态特别复杂的语言。^③可见，是否具有屈折形态与派生构词手段并不能够先验地成为判断语言先进与落后的所谓“标准”。这就是说，有屈折形态与派生构词手段的语言未必一定就是先进的，没有屈折形态与派生构词手段的语言如汉语也未必就是落后的，甚至呈现出反向性，有屈折形态与派生构词手段的语言可能非常落后，没有屈折形态与派生构词手段的语言可能也很先进。即便在印欧系语言的内部，语言的屈折形态表现也不一致，如瑞典语的屈折系统要比德语简单，而德语的屈折系统又比拉丁语和希腊语简单，甚至有的印欧系语言的发展方向似乎也是相反的。

比如，Ackema 和 Neeleman（2007）所列的意大利语与英语的单复数变化形式对比^④：

	意大利语	英 语
第一人称单数	parlo	speak
第二人称单数	parli	speak
第三人称单数	parla	speaks

① 根据这一发展序列，汉语可称为世界上最为落后的语言。由此的推论就是，以此语言负载的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甚至社会教育、价值观念等都是落后的。注意，这里的世界语言发展序列有先验的成分，同时也是西方根据自己语言的形态特征所做的推断。

② 高本汉（1926），第6页。

③ 高本汉（1946），第50页。

④ P. Ackema, A. Neeleman, “Restricted pro drop in Early Modern Dutch”,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Germanic Linguistics*, 2007, 10, pp. 81-107.

第一人称复数	parliamo	speak
第二人称复数	parlate	speak
第三人称复数	parlano	speak

可见，与意大利语相比，英语中的屈折形态已经变得十分贫乏，仅有一个表示第三人称单数的词缀“s”，根本无法通过屈折形态准确地确定主语的人称、数。

在高本汉看来，英语中早期存在着的词类范畴的形态差异，后来基本都被舍弃，出现了词类的兼类现象。比如早期英文中的 *cleanse* 与 *clean* 是动词与形容词之别，形容词后加“se”作为动词的后缀，后来则由 *clean* 兼类动词 *to clean* 与形容词 *clean*，英语中不再出现这样的句子：

(1) I cleanse the table. (我使桌子清洁 = 我擦桌子。)

而是直接变成这样的句子：

(2) I clean the table. (我清洁桌子 = 我擦桌子。)

同样地，*table*、*book* 等语词也兼具了名词 *table*、*book* 与动词 *to table*、*to book* 的功能^①，在类型上英语变得与汉语这样的孤立语越来越类似。

当然，汉语、日语等东亚语言走得更远。在这类语言中没有屈折变化，根本就不存在标示人称、数的“一致关系”的语法范畴。“把中国语分列为‘初等’的语言，以为他还未进到变形的阶段，这种学说恰好和真理相反”^②，高本汉由此得出结论：“事实上，中国语正和印度欧洲语言演化的轨迹相同，综合语上的语尾渐渐亡失了，而直诉于听受者（或诵读者）纯粹的论理分析力。现代的英语，在这方面，或者是印欧语系中最高等进化的语言；而中国语已经比他更为深进了。”^③

这样看来，在高本汉的眼里，汉语的所必然附载的“原始、初等”特征的论调可以休矣。

2 汉语的“孤立语”表征

高本汉对汉语的特性归纳非常清楚，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共同特性大致有二：孤立语性质和单音节性质^④，并就汉语的单音节的孤立语性质进行全面的分析。他看到汉语“没有一种单纯语词，是由转成上的附添语所构成的”，“没有应用附添语来表示文法上的各种范畴”^⑤，同时也强调中国语的“复合语词是很丰富的”，只是“单纯语词”“总

① 高本汉 (1946)，第 2 页。

② 高本汉 (1923)，第 27 页。

③ 高本汉 (1923)，第 27 页。

④ 高本汉 (1946)，第 42 页。

⑤ 高本汉 (1923)，第 26 页。

是包含着——有几个例外，可是不很重要——单个的音缀”^①。这两点使得汉语中的每个单字无论在句子中做什么成分，起什么作用，其形式都是不变的。他举例说，比如汉语中的“人”既可以指英语中的 man，也可能指英语中的 men，或者 the man、the men、man's、men's 等，表示单数、复数、主格、属格等似乎都可以，字形本身并无改变；同样地，汉语中的“去”，既可以表示英语中的 go，也可以表示英语中的 goes，当然也可以是 went、to go、I have gone、I will go 等。

对于汉语的二语学习者而言，“大多数中国语的语词，意义的应用，极端自由”，这一点“实在是个最严重的——即使不是真正最大的困阻”^②，“中国语的语句里，语词彼此的关系，没有形式上的表明，只有他一种主要的措辞方法，语词的序次，也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略资补救”^③。可以说，也正是汉语这种不改变词形的性质构成了欧洲学生习得汉语的最大困难。

汉语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不是类似于印欧语中那样依靠屈折或者派生的方式明确进行表达，而是根据语序及其上下文的语词关系进行理解，这对欧洲人理解汉语而言则需要太强的“猜测力”^④。在欧洲那些学习汉语的大学生眼里，“中国语的语句，比较欧洲语实在是一种很‘简略的辩论法’（brachylogical）。……主辞和述辞，假使其中的一个可以从上下文里看懂的，那就无需……把他们统统表示出来”^⑤。如此说来，语法分析对学习汉语、理解汉语每句话的意义并无什么帮助，恰恰需要的却是通过广泛阅读得到的体验或者说是汉语造句的那种感觉，这就使得汉语的习得需要学习者进行太多的“琢磨”，而不像学习拉丁语或者德语那样，只需要了解语法知识再加上一部词典，就可以了解每句话的意思。“能用一个有历史依据的隐喻语，中国人最所欢迎。”“依这种方法，渐渐集合成为专门名词的宝藏。”^⑥

或许这也正是西方汉学家们特别喜欢编写汉语语法书和编纂汉外词典的理由，因为他们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语法书 + 词典”的双结合手段来学习语言的。这样的组合形式既然可以很好地习得印欧系的诸多语言，那么自然也就可以习得汉语。

我们知道，类似英语那样，词类的标记一般都有形态来作为区别特征，名词、动词、形容词都具有其各自不同的语法形态。在高本汉看来，这种狭义的形态在汉语里根本就没有，同一个没有多少变形的单音字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或形容词。他举例说，比如“远”，在“远方”里作形容词，在“南蛮之远”里作名词，在“远盗贼”里则是及物动词，在“君子远庖厨”里又作不及物动词，这就让欧洲初次接触汉语的学习者难以把握。^⑦

同样地，在英语里，连词与介词作为两个词类，与名词、形容词、动词区别明显，

① 高本汉（1923），第22～23页。

② 高本汉（1923），第119页。

③ 高本汉（1923），第120页。

④ 高本汉（1946），第42～43页。

⑤ 高本汉（1923），第120～121页。

⑥ 高本汉（1923），第137、141页。

⑦ 高本汉（1946），第44页。

连词类的 when、while、although、then 等，介词类的 in、by、with、under、till 等，这些词类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独立性都很强，并不与其他词类混淆。^①但是，到了汉语里，情况则大不相同，连词与介词本身就来自名词与动词，而且其本身仍然还可以作动词与名词使用。比如：

(3) 当我到时。

(4) 他当老师。

(5) 上他的当。

同样的一个词的形式“当”，在例(3)这句话里“当”是连词，到了例(4)里“当”变成了动词，例(5)里的“当”则又成为名词。问题是，欧洲的汉语学习者没有汉语母语者的语感，他们缺乏对词语关系的推断，怎么能够断定句子中的“当”是个什么词呢？看起来只能根据上下文意进行推测。

基于此，高本汉索性这样论述道，没有什么语法能够足以帮助我们剖析汉语的句子，“这需要有猜测力，或者更确切地说，需要体会中国人造句的方式，需要体会他们用言语表达思想的方式。你必须了解中国人的思路，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读书，读书，再读书，使你习惯中国人的思考方式，直到你能像中国人那样自动思考时为止”。^②对此，高本汉举例说明如下：

(6) 拿开水。

在汉语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屈折手段能够标明“开”是“水”的修饰语。问题的难点还在于，汉语里单独一个不变形的单音节词“开”就已经很难懂，何况“开”还可以作“拿”的补语，比如“拿开”。^③

对此，高本汉感叹说，汉语里“没有语法的帮助太不幸了”^④。言下之意是，汉语缺乏屈折形态变化，使得在短语与句子结构中造成了语词理解的困难。同时，汉语的构词似乎也少了西方语言常用的派生构词。他说道，“可是除了一些独立助词结构之外，汉语不仅没有屈折变化和各个词类之间的形态区别，而且，我们必须补充说，它还显然拒绝使用我们西方语言中惯用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这就是通常说的派生法。”^⑤比如：

(7) 以路之长。

汉语里缺乏西方语言的派生构词，能够在词根“long（长的）”的基础上造出“length（长度）”，但是汉语里“以路之长”中的“长”则必须参照上下文才可以确定这里的

① 高本汉（1946），第44页。

② 高本汉（1946），第45页。

③ 高本汉（1946），第47页。

④ 高本汉（1946），第48页。

⑤ 这里所论，或许也就是高本汉研究“汉语词族”的内在缘由。参见高本汉（1946），第48页。

“长”用作名词（length），而不是形容词（long）。^①

高本汉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在上古时期，汉语系统内并不存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之类的词类之别^②，因为汉语的一个词并不局限于一个确定的词类，汉语中的一个词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形容词。如果一种语言里的词可以如此兼类，其词类的划分则没有太大的意义。西方汉学里这样的论断不断出现。早在17世纪，意大利的卫匡国《中国文法》在谈到词类时，他认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因此词类的划分并不能照搬西方的划分标准，一个词由于在句中位置不同，也属于不同的词类，如“我爱你、我的爱”。因此汉语词类很难像西方语言一样有明确的界限。^③可见，认为汉语词类之间一是难以划分，二是划分没有多大意义，这样的想法不是偶然的。

在高本汉看来，汉语的这一现象与英语并无太大差别，所以他提出了词类的两种概念：一种是广义的、心理学上的“词类”，另一种是狭义的、语法学上的“词类”。前者指的是词的固定基本意义，后者指的则是词的临时语境意义。一如英文中的table，指的是一种实在的物体，临时处于“to table the question”中则是动词“摆出”，其基本意义仍然是名词；汉语里的“长”，表示的是一种性质，临时用作名词或动词，丝毫没有干扰“长”专有的基本意义，而成为“长”的业余兼职意义。^④

在很多的情况下，汉语中表面上不变词性表现为孤立语特征，它们的语音形式和语法作用没有固定的联系，何况就是在许多有确定的形态关系的情况下，人们依然意识不到其中的词法形态作用。^⑤比如“ts'am”（名词）和“s'am”（数词）词源关系很近，形态上确实有差别，但是形体固化的单一“汉字”表示了这里讨论的来自一个语根的两个同源词，前者为“参”，后者为“三”。可见，早在3000多年前，因为汉字的固化作用，汉语的孤立语性质就已经确立。和谐与简化的音变，也导致汉语逐步丧失了当初的屈折形态手段和构词形态系统，除了个别助词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语法手段^⑥，使得汉语的句子看起来完全是由一串没有屈折的、不变的音节连缀在一起。在印欧系语言的汉语学习者看来，似乎汉语中的每个单音节都是孤立的，一个词本身就是字源，与汉语中任何别的词都不属于一个词根，这是他们学习汉语觉得最难的地方。^⑦

高本汉的结论是，现代汉语最重要的特征还是其孤立语的性质，也就是没有典型的词形屈折手段，没有从一个共同词根构成几个新词的词语派生，没有用不同的形态来表示不同词类的语法差别，而早期原始汉语的特征恰恰不是这个样子。^⑧不过，高本汉认为，汉语的孤立语特征正是印欧系语言中那些基本特征长期发展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来

① 高本汉（1946），第49页。

② 高本汉（1946），第64页。

③ 卫匡国：《中国文法》第二章，白佐良、白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113页。

④ 高本汉（1946），第66～67页。

⑤ 高本汉（1946），第74页。

⑥ 高本汉（1946），第74～75页。不过，在我们看来，这里的语法手段应该是最为狭义的形态手段。其实站在广义上看，任何一种语言中都不可能没有语法手段，比如重叠、韵律等或许都是汉语的语法手段。不过站在印欧系语言的立场，形态手段没有了，其他的语法手段似乎都不算。

⑦ 高本汉（1946），第75页。

⑧ 高本汉（1946），第73页。

说,汉语类似于英语,不过在简化的道路上走得比现代英语更远。这样说来,对来自印欧系语言的汉语二语学习者而言,学习汉语中的这些困难,就是缺乏印欧系语言中所习惯的表示屈折和派生的形态,这也是掌握汉语文献语言最大的绊脚石。他认为“汉语语法事实上非常贫乏,它主要是规定词在句中的位置,再加上一批语法助词的作用。所有在我们的语法中称为变格和变位的情况,以及构词的原则,在汉语中几乎都看不到。汉语不用像各种词根或词尾变化那样的特殊标记来表明所要求的词类、名词的数和格、动词的时态和语态,这使汉语变得异乎寻常地简洁”,与欧洲的语言相比,“汉语几乎不能帮助我们通过一些明确可解的迹象来确切找出词义和词在句中的作用”,“正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构形法,这就强烈要求人们具有猜测能力,而这正是学汉语最大的困难”。高本汉由此得出他的结论,即对于欧洲的汉语学习者而言,“主要的难点根本不是汉字的形体,而是汉语的孤立语性质”。^①

3 汉语的“单音节”特征

高本汉注意到,汉语包含几千个不变的单音节词,这些词似乎完全独立,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联,因而看起来一个词不会从另一个词派生而来。同时,这些单音节词从来也不用词根的屈折变化来表示词类或词的句法功能。^② 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汉学家顾路柏(Wilhelm Grube, 1855—1908)^③ 曾经提出,汉语中的一字两读的情形似乎也说明,汉语单音节词的语义之间是存在关联性的。^④ 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究竟是汉语发展的原始情形还是后起的状况,言下之意,汉语的“单音节的孤立语”特征是“原生态”还是“再生态”的问题。

原始汉语是否具有“单音节的孤立语”不同的形态特征,最初的性质并不同于孤立语,只是后来走了类似英语的形态变化的精简路线,而最终与屈折语的形态分道扬镳,变得与原始汉语“面目全非”,以至于今天看起来似乎完全“沧海桑田”,与印欧系语言的形态特征泾渭分明,自成一体。汉语的单音节词的语义之间表面上似乎没有关联,问题是在词根上确实能够如此切割清楚吗?请看表1。^⑤

① 高本汉(1946),第49页。在后文中,高本汉也认识到,“孤立语性质在今天可以看成是汉语的主要特征,而汉语最初的性质并不同于孤立语,不过,在能构拟出汉语的古代音韵之前,这个理论却始终是个猜想”,这是因为“那时人们对古汉语音韵简直一无所知,他们都是根据北京官话、广州话或者其他一些方言的现代读音来从事研究的”,而“作为他们理论基础的那些材料由于长期的发展而变得太简化、太贫乏了。这些音系实在不堪使用,因此凭借这类材料几乎不可能得出任何令人满意的结论”。[高本汉(1946),第51页]

② 高本汉(1946),第50页。

③ 也译作顾威廉,德国早期著名的汉学家。1884年顾路柏曾向普鲁士文化部提出在汉语课程中进行口语教学的问题,这促进了后来东方语言研究所的建立。自1885年起,顾路柏兼任柏林大学教授并主持“东亚语言”讲座,讲授汉语、满语和蒙古语。1892年他应聘为汉学教授,讲授汉语和满语课程。

④ 高本汉(1946),第51页。

⑤ 表格中所列内容参考高本汉(1946),第67~71页。另外,“汉语古代书音以四声区分词性及词义,颇似印欧语言中构词上之形态变化”,参见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12~113页。

表 1

单音节词	语法范畴	发音	单音节词	语法范畴	发音
见	主动动词	kian	卒	名词	tswət
	被动动词	g'ian		动词	tsiwət
解	动词	kěg	度	动词	d'ak
	形容词	gěg		名词	d'ag
卷	动词	k'wan	复	动词	b'uk
	名词	g'wan		副词	b'ug
长	动词	t'iaŋ	塞	动词	sək
	形容词	d'iaŋ		名词	səg
传	名词	t'wan			
	动词	d'wan			

可见，这些共同词根的形态变体有时表达的就是纯粹的语法范畴，如动词与名词的对立、形容词与名词的对立、动词与副词的对立、形容词与动词的对立、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对立、主动态动词与被动态动词的对立等。由此推及，高本汉认为，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存在着与法语和拉丁语一样的主格属格和与格宾格等格关系的对立手段，并且使用了屈折手段，运用词本身的变化来表达这种语法形态的意义。对此，王力的认识也基本一致，他说：“欧洲语言的滋生词，一般是原始词加后缀，往往是增加一个音节。汉字都是单音节的，因此，汉语滋生词不可能是原始词加后缀，只能在音节本身发生变化，或者仅仅在声调上发生变化，甚至只有字形不同。这是汉语滋生词的特点。”^①

对原始汉语中存在真正的屈折手段，高本汉还列举了一系列语音转换的例子进行说明，从中可以看到汉语中的双音化词的构成似乎也不是随意的，许多都是同根词语音选择的结果。比如：“宦官、官宦”，其中“官”的读音为 [kwan]，“宦”是 [g'wan]，就是不送气清声母与送气浊声母的转换^②；“圆圈”，其中“圆”的读音为 [g'wan]，“圈”是 [k'wan]，就是不送气浊声母与送气清声母的转换^③；“扫帚”，其中“扫”的读音为 [sug]，“帚”是 [tj'ug]，就是塞音声母与擦音声母的转换^④；“死尸”，其中“死”的读音为 [s'ar]，“尸”的读音为 [ɬ'ar]，就是舌音与齿音的转换^⑤；“开启”，其中“开”的读音为 [k'ar]，“启”的读音为 [k'iar]，就是零介音与 i 介音的转换^⑥；“观看”，其中“观”的读音为 [kwan]，“看”是 [k'an]，就是零介音与 w 介音的

① 王力，《同源字典》，第 46 页，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② 高本汉（1946），第 58 页。
③ 高本汉（1946），第 58 页。
④ 高本汉（1946），第 59 页。
⑤ 高本汉（1946），第 59 页。
⑥ 高本汉（1946），第 60 页。

转换^①。

高本汉注意到汉语发展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古代汉语的音系要比现代汉语丰富，比如上古汉语中的一整套辅音韵尾 p、t、k、b、d、g、m、n、ŋ、r 等，到了现代汉语通用普通话中，p、t、k 脱落了，b、d、g 消失了，m、n 合流了，辅音韵尾系统已经简化为 n、ŋ、r。在高本汉看来，这一简化也同样发生在元音系统，上古汉语中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单元音与双元音，后来都合并发展成为少量的简单类型。^② 由此，高本汉得出他的结论，在早期的上古汉语里，声母中所有的舌根音 k、k'、g、g'、ŋ、x 都可以在词族内部通转；所有的舌尖音 t、t'、d、d'、ts、ts'、dz、dz'、s、z 都可以在词族内部通转；当然所有的舌面音 tj、tj'、dj、dj'、ɕ 以及所有的唇音 p、p'、b、b'、m 也都如此。同样的，中介元音有无 i、i、w、iɥ 也可通转，收尾辅音 ŋ、k、g 组，m、p、b 组以及 n、t、d、r 组的鼻音与口音对转，都体现了早期汉语内部的语义相近，语音转换也很规则。^③

根据高本汉的举例，英文中的 bear（熊）、bear（负担）、bare（裸体）这样的同音异形字在公元前就很少，后来发展为同样的读音，表示的意义有别，形体也随之不同。^④ 与此同理，语音系统的简化也导致了汉语出现大量的同音异形现象。比如，“我见”“我建”“我贱”中，本来其中的“见”“建”“贱”读音并不同，语音系统简化后则变成相同了，那么，在口语里就很难区分说话人说的语音流“wojian”究竟是“我见”，还是“我建”“我贱”。^⑤ 高本汉认为，“中国文字的刚瘠性，保守性，不容有形式上的变化，遂直接使古代造字者因势利导，只用一简单固定的形体，以代替一个完全的意义”^⑥，接着，又提出“在纪元前的年代，中国语的形式与声音，已经达到极单纯的局势；遂使其文字的结构，具有一种特别的性质，辗转循环，又影响于后来语言的发展，至深且巨”^⑦。他这里所言的“极单纯的局势”，指的就是汉语的“单音制，无形式变化，缺少仆音^⑧群，语尾运用仆音很有限制：这些现象，都是使中国文字成为方块头，发生许多形体类似，笔画紧密的原因。所以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文字，不特能够同行，而且极其自然，没有什么阻碍”^⑨。可见，本来上古汉语中的每个字一般都依据其读音可以和其他大多数的字区分开来，所以单音节构成的一个结构或者句子也是明白易懂的；但是，因为语音的简化而出现大量同音字的干扰，使得在口语中难以通畅地理解其意义。这样，单音词明显不够用。为了避免歧义，更为清楚地表达意义，就必须采取进一步解决的方法，即在口语中产生大量的复音词，便造出“复合字”（compound

① 高本汉（1946），第60页。

② 高本汉（1946），第39页。

③ 高本汉（1946），第64页。

④ 高本汉（1946），第39页。

⑤ 高本汉（1946），第40页。

⑥ 高本汉（1926），第15页。

⑦ 高本汉（1926），第17页。

⑧ 此处应该指的是复合辅音。

⑨ 高本汉（1926），第32页。

words)。同时,为了区别同音字,就加上表意的偏旁;没有语缀,便造出语助词;等等。^① 上述的“我见”就扩展成为“我看见”,“我建”成为“我建造”,“我贱”成为“我卑贱”,双音化也就成为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构词系统的基本区别。

讨论到这里,似乎也可以说明汉语的构词古今差异的根本问题了。不过,原本作为汉语附属的汉字因为其独特的效用而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口语形式交际中的“我见”“我建”“我贱”确实难以区别,但是一旦书写出来,并不会产生任何意义上的误解,字形可以明确地区分彼此,而不论其读音如何。读音可以随时随地发生变化,甚至是“尔曹身与名俱灭”,可以变得相互之间存在云泥之别而显得面目全非,语音上可以彼此“耳聋”难以听懂,甚至口语难以交流;但是汉字却是维持原状,仍然可以“不废江河万古流”。

4 结 语

对中国语文的特点,拿欧洲语文来参照,早期中国的学者对此也有认识。比如与高本汉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的一位中国学者朱光潜,则站在文学与翻译的角度做了考察,他认为,首先,“中文也并非没有文法,只是中文的弹性比较大,许多虚字可用可不用,字与词的位置有时可随意颠倒没有西文文法那么谨严。因此,意思有时不免含糊,虽然它可以做得很简练”;其次,“中文少用复句和插句,往往一义自成一句,特点在简单明了,但是没有西文那样能随情思曲折、变化而现出轻重急徐,有时不免失之松散平滑”,总之,“中文以简练直截见长,西文以繁复绵密见长,西文一长句所含包的意思用中文来表达,往往需要几个单句才行”。^② 基于此,朱光潜提出,“各国语文习惯本各不相同,我们固然不能拿西文文法来衡量中文”,但是中文的一些欠缺也“不全是习惯问题而是思想的谨严与松懈问题”,这些方面朱光潜认为西文要比中文好,当然,各国语文都有它的特性(法国人所谓 *génie*)^③,这样看来,也算是英雄所见略同。

当代的汉语语言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很多问题的分析在早期已经研究得比较清楚了,现在的一些研究却无视以往已经获得的清晰认识,割裂了学术研究的传承性,而只是运用一些新的术语抑或是一些生吞活剥的理论把已经清楚的问题复杂化,使得一些问题在认识的层面产生了模糊、混淆的现象,表现出极其明显的理论与问题研究的“碎片化”特征。

汉语在世界上的语言序列中无疑是“特立独行”的,我们的研究应该着力归纳与

① 有学者的观点与此并不一致。比如李如龙认为,随着认知的发展,汉语为了表达更多的概念,单音词又受到音节数的局限,只好扩充字义、增加读音,以多音多义字济词汇之穷。多音多义字大量增加之后,同音词就难以避免。这不但增加了学习的负担,也造成字义的交叉和含混。为了克服单音词不够用和多音多义字含混的局限,两个字组成的词组渐渐浓缩成词。双音合成词大量增加,成了上古汉语发展为中古汉语的重要标志。可见,中古汉语后,汉语的双音化与复合词的大量出现,其内在的原因与机制究竟如何,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参见李如龙:《汉字的类型特征和历史命运》,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学术沙龙报告稿本,2015年。

② 朱光潜:《谈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③ 朱光潜:《谈美》,第167页。

分析其类型特征。只有如此,汉语语言学研究才有可能在理论上获得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汉语语言学研究作为“汉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未必一定是中国人的专利,来自“他域”学者的观察与研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高本汉从自己的经验、直觉出发,带有类型学的视野,他对汉语的清晰认识,建立在“研究者”“学习者”“传授者”的三重身份上,或许他观察到的汉语特质是我们母语研究者看不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汉语而言,也许来自他域的观察恰恰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汉语的“庐山真面目”。

参考文献

- 方环海,林馨.英国汉学中的汉语词类特征研究——以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与萨默斯《汉语手册》的对比研究为例[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5(3).
- 方环海,沈玲.西方汉学视域下汉语量词的性质与特征[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6(3).
- 方环海,尹叶.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对汉字特征的认识与研究[J].郑通涛.国际汉语学报:第6卷第2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
- 方环海,郑通涛,陈婷婷.全球视野下的汉语在外教学[J].海外华文教育,2016(3).
- 方环海.西方汉学与汉语特征研究[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
- 高本汉.汉语的本质和历史(1946)[M].聂鸿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高本汉.中国语言学研究(1926)[M].贺昌群,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 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1923)[M].张世禄,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 胡荣,方环海,陈秀玉.罗存德《汉语语法》与汉语特征研究[J].海外华文教育,2016(4).
- 李如龙.高本汉论汉语汉字特征的启发[J].海外华文教育,2017(4).
- 李如龙.汉字的类型特征和历史命运[M].厦门: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学术沙龙稿本,2015.
- 王力.同源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武和平,王晶.“基于用法”的语言观及语法教学中的三对关系[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6(3).
- 徐丽.《官话指南》在日本汉语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贡献[J].海外华文教育,2015(1).
- 张品格.17—19世纪西方汉学论著中的汉语时体表达手段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16.
- 周祖谟.问学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6.
- Ackema P, Neeleman A. Restricted pro drop in early modern Dutch [J].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Germanic Linguistics, 2007 (10): 81–107.
- Summers J. 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63. (该书中文本名为《汉语手册》,方环海,于海阔,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 Tyler A. Usage-based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0, 30: 270–291.